

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

下 册

新文艺出版社

本書裝訂時，下冊第 646 頁至 649 頁及第 689 頁至
第 704 頁兩篇文章臨時抽去，特此聲明。
新文艺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

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綫而斗争

*

新文艺出版社編輯、出版

(上海康平路 155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11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 1549

开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張 39 7/8 字数 809,000

1957 年 11 月第 1 版

195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7,000 全兩册定价 (7) 4.00

許杰在文艺上政治上的反动道路

——列席上海市第二届人代大会
第二次會議上的联合書面发言——

叶以群 孔罗荪 姚文元

許杰在“鳴放”期間，忠实地执行了“章罗联盟”的反党綱領，进行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可是他在八月十六日人代会預备会的交代中还是狡賴地說什么：“我投机，表面上装作进步，我騙了別人，也騙了自己。”“我从来不知道我的立場是反动的。”“我的这种反动思想是一貫支配着的，只是我自己不知道就是。”

从这些話看来，似乎許杰的言論和行动都是无意識的，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做那一切。这完全是騙人的謊話。为了証明許杰的言行既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无意識的，我們想从他的文艺思想方面来作一个簡單的揭发和分析：

一九二五年，許杰写了“飄浮”，后来輯成小說集，于一九二六年出版。在“自序”中，他对当前的生活表示了极其悲观失望的情緒，他說：“我只看到一些无可掙扎的灰色的人生。——他們都是无灵魂的，兽欲的，罪恶的。”“我覺得現在

的人类(至少我眼中看到的)是不能有‘自由意志’、他們都在无可如何的大力的命运之下挣扎。现在的社会,也是太失望了,理想的社会也不会在这丑恶的社会中产生。”当时正是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的时候,許杰竭力向青年宣傳这种灰暗、絕望、听天由命的沒落思想,它起的作用就是削弱、破坏青年的革命意志,打击他們积极进行革命斗争来改造社会的理想,引导他們走向頹廢、反动的道路。

在这本小说集中,有一篇“琴音”,他把一个农村中的恶少“老叶”——一个极端无耻、到处“擄掇”略有“风姿的少女,以喂足他暴虎似的色欲”的恶霸,一个侮辱了一个少女,逼得她堕胎而死、她母亲上吊而死的殘酷的坏蛋,写成为受苦受难的人,竭力去描写这个恶霸(后来变成算命瞎子)晚景如何“凄清悲凉”,小说中沒有一点对这个有血債的恶霸的仇恨,反而用怜悯的文辞引起人們对这个恶霸的同情。在革命的高潮中写出这样的作品,足以說明許杰的立場是站在哪一方面。

一九二六年,他写了中篇小说“暮春”,通过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李哲生的口,发出了誣蔑共产党的毒箭:

他曉得自由二字,常常与共产相連的,而共产便是赤化,在另一方面,便連帶起公妻——这还成什么話呢?(第18頁)

他們实在沒有想到自由的連帶成分,会是共产,会是公妻,会是恋爱自由,性交公开的。他們真呆呀!他們的失敗,便是不經世事,便是在此。(第19頁)

写下这些话的时候，他没有作任何的批判，这实际上就代表了许杰自己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反动观点。这同国民党特务机关诬蔑共产党的话一模一样。整篇小说，也都是宣传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同当时进步的、民主革命的潮流完全是敌对的。

大革命失败以后到一九二九年，许杰所写的小说汇集在“火山口”这本集子里。就整个倾向而论，这本小说比以前两本更反动、更色情、有着更浓厚的毒素。他说这本小说是受反动的弗洛伊特学说的影响，“想以性的行动，为一切的中心行动，而去解决，观察一切的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这种哲学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中最反动的一派，它同阶级斗争的革命理论是针锋相对的，它同中国革命和进步思想势不两立而为国民党反动派所欢迎、所鼓吹，而许杰在小说中宣扬的反动思想，则又远超过弗洛伊特学说本身。

不需要在文字上去引用那些色情的描写。我们想从政治上来看一下。例如在“你的心曲”一篇中，他借口一个青年男子的独白，发出了诬蔑中国妇女运动的叫嚣，企图把青年在旧社会中所受的反动统治的迫害，全部恶毒地歪曲成是青年女子的“诱惑”所致，想把斗争的矛头从敌人转向被压迫的妇女，以分裂人民的团结。请看下面一段：

关于妙龄青年美女的追慕，我早已否定了。这一种“人类的恶之花”，“活的死尸”，“白日的妖精”，“迷人灵魂的鬼魅”，我现在是恨之入骨了，我天天在诅咒着她，我祈祷她早些死亡；……你这些肉的兽性发泄机，用美丽的

表皮包着恶臭的膿包的賤女人啊！……

凡是可以用来侮辱青年妇女的詞汇，他差不多都用上了。中国青年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两个組成部分。誰都知道，青年男女在旧社会中所受的痛苦，婚姻不自由，根本原因是反动統治的迫害，要得到婚姻上的自由，首先要推翻压在他們头上的三座大山，而許杰竟搬出“女人是禍水”的濫調，把一切痛苦归諸于女性的“引誘”，这是一种非常反动的政治思想。

“火山口”是完全为弗洛伊特的反动学說作宣傳的小說，小說中的“我”是一个只有兽欲（所謂“性欲的火山口”）的人，什么階級性，什么反动統治的压迫，什么革命斗争……全部被否定得干干净净。它只宣傳这种思想：人之所以有苦悶和痛苦，与“社会問題”毫无关系，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毫无关系，唯一的原因只是性的苦悶，小說中还不堪入目地描写着同性恋爱。这种小說在当时就是起着替国民党反动派腐蝕青年、进攻革命的作用（特务文学的特征之一，不就是色情么？）而且，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作者隐藏着怎样丑恶的灵魂。

在这本書的“新序”中，許杰自吹自擂地說：“若我这种人物”，“罵社会”，“罵金錢”，“倒觉得有点勉强，有点假装”，“克制”自己，“好象便根本不要怎样的力量，只要少装一点假，听其自然的样子，那所謂的反革命的脾气便自然会克制了的。”这里，他把別人的罵社会誣为“假装”，而吹嘘他自己伪装的本領高明，“根本不要怎样的力量”，就可以用“自然”的假面具来掩盖他“反革命的脾气”。他以为这一套手法十分巧妙，所以

一直运用到今天，但“这种人物”的伪装在社会主义革命巨流的冲击下是必然会被彻底揭穿的！他的“反革命的脾气”如果还不肯挖掉，就必将自绝于人民。

二

許杰在交代他的反动历史时，輕描淡写的說到抗战期間，他在福建教書，“也写了一些所謂文艺論文，却又借着环境特殊的名义，自己主观上認為打打掩护，于是就引用了反动头子蔣介石、孙科、梁寒操的說話”，他說这样做是为了“吓吓国民党小鬼”。

許杰把他在抗战后期为国民党反动統治推动东南文艺的活动，說得多么輕巧，倒很象他是在那里做进步的工作，所以才在当时引用了許多反动头子的“說話”，那不过是为了替自己打打掩护、“吓吓国民党小鬼罢了”。这一段話是彻头彻尾的謊話。

抗战后期，他写了一本十几万字的書，叫做“文艺批評与人生”，是在一九四五年上饒战地图書出版社出的，上饒是国民党反动派头子顧祝同的大本营，反共的前鋒陣地。許杰就是在顧祝同統治的这个反共陣地上当了一員反共的文艺統帥。許杰是很想干一番事业的，他在当时的福建、浙江、江西一帶，充当了一員主將，发号施令来推动他的所謂“东南文艺运动”，他是有最高准則，有具体綱領，有組織路綫的。

許杰在“論文艺批評的建設性和积极性”一文中提出了：“文艺运动的最高准則，是和現阶段的最高国策相互一致的。”

抗日战争的后期，蔣介石反动王朝的“最高国策”就是“积

极反共，消极抗日”八个大字。在軍事方面，国民党的主力部队是在包圍着解放区；政治方面，有所謂“防止异党活动条例”，对民主运动采取高压；文化方面，对一切进步的文化艺术活动采取扼杀和禁止的办法；經濟方面，是官僚資本壟断，大量掠夺人民財富，通貨恶性膨脹，民不聊生。这就是抗战后期蔣介石国民党統治区域在那反动透頂的“最高国策”下的一幅图画。許杰在东南提出来的文艺运动，就是要为蔣介石这样的“最高国策”服务。

許杰是深知不采取組織活动是不能进行他的这个“文艺运动”的，因此，他煞費苦心地想把当时被日本帝国主义割裂的东南地区組織起来。他在“东南文坛与东南文艺运动”一文中提出了他的組織方案：

假定我們从江西的贛州算起，在贛州有正气日报的“新地”，青年报的“青鳥”，向东过来，在上饒有前綫日报的“战地”，在福建方面，永安的民主报有“新語”，南平的东南日报有“笔垒”，至浙江方面，丽水的浙江日报有“江风”，东南日报的丽水版也有“笔垒”，浙东方面，宁波的宁波日报有“波光”，天台的青年日报有“語林”……。

許杰还做了具体的統計，認為把这些陣地联合起来，每月的总成績，就有一百万字以上。他說：“这是个巨大的数字”，他認為“把这两三百位文艺工作者集攏来”，就会形成一个“很大的陣营”，表现出“很大的力量”。

有了“最高准則”，有了“組織方案”，就一定有“具体綱

領”。在他这本“論文集”中，就最具体的提出了为蔣介石的“最高国策”服务的文艺綱領。

第一、“文艺教育論”。他主張文艺要为蔣介石王朝的反动政治宣傳和反动教育服务。他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就引用了蔣介石那本臭名远揚的所謂“中国之命运”一書的一段話，做为他这一条“文艺教育論”的綱領的引言，許杰在这里十分強調文艺的政治作用和教育作用，正是为了要使他所推动的文艺运动为蔣介石的反动政治服务。

第二、“文艺建設論”。許杰主張歌頌国民党反动派統治的“光明”，反对暴露国民党的黑暗。抗战后期，国民党的反动統治更加腐爛，暗无天日；当时不少进步作家对反动統治的黑暗，作了暴露，和反动統治者及其御用文人展开了斗争。这种暴露文学必然引起敌人的深恶痛絕，一方面采取压迫、扼杀、禁止的手段，另一方面又进行分化和拉攏。例如一九四四年冬，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宣傳部部长梁寒操，在重庆召开了文化界座談会，就針对着暴露黑暗的文艺提出了批評，要求大家歌頌“光明”。那时进步报刊上对此进行了回击，但是許杰在“东南文坛”上却采取了欢迎的态度，表示了他对梁寒操的言論衷心的拥护，說什么梁寒操提出的“文艺批評的建設性与积极性，的确是非常的切实而有理的”，他引伸了梁寒操的意見，把暴露文学称之为“破坏性与消极性的文学”。他还說：“在文化运动方面如果不預先积极的击破反动的文化体系，暴露他的理論的弱点，那么，正面的文化建設也就等于空中樓閣了。”許杰所要击破的“反动的文化体系”，也正是国民党文化特务对进步文化运动的污蔑。难道这还不够說明許杰的坚定的反动

立場么？

第三、文艺自由論。許杰在販賣了蔣介石、梁寒操的反動謬論之后，又来推荐孙科的假民主。許杰的这个“文艺自由論”就是脱胎于孙科的所謂“三大自由”說。他还为孙科吹嘘，說什么孙科的三大自由比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更为切实，孙科的“三大自由”不过是騙人的鬼話。他用“民族自由”来抵消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說什么“民族得不到自由，政治与經濟是无法自由的”，实际上是按照国民党的“最高国策”进行的消极抗日的投降路綫，所謂“民族自由”，不过是一句騙人的謊話。当时，中国共产党对时局提出来的口号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結、反对分裂，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在党领导下以热火朝天的民主运动，首先要政治民主，释放政治犯。孙科的“三大自由”正是针对当时的民主运动而提出来的反动口号。許杰在这一場斗争中，衷心的拥护孙科的所謂“三大自由”，暴露了他自己的明确的反动立場。他引伸了孙科的話說：“民族自由，比一切任何自由，更为重要。”还由此为反动的“民族文学”运动做下了伏笔。他更猖狂的号召要把这个所謂“文艺自由”当做当时文艺运动的总的口号。这是明目張胆地为国民党反动統治粉飾太平，为反动的“最高国策”服务。这是彻头彻尾的反共反民主！

第四、“民族文学論”。他繼承了張道藩、陈銓的“民族文学”的反動理論，进一步的加以宣揚，同时，还用了恶毒的手段来反对文学的阶级性。許杰完全拥护陈銓所划分的“五四”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三阶段”：个人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認為社会主义文学永远一去不复返了，現在只有“民族文学”

是“最要得”的文学！許杰深深懂得要拥护“民族文学”，就必须反对文学的阶级性，就必须反对社会主义文学；他大声疾呼的认为如果真有什么人“把全世界人类分成两种不同的阶级”，“我们是应该毫不留情的攻击的”。許杰们确实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给与了毫不留情的攻击，说什么谁主张分阶级，谁就是“汉奸败类”，谁不服从他那个“民族文学”运动，谁就是“汉奸败类”。他的这些攻击还不够恶毒么？許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早在一九四四年就已下定决心了！

第五、“资本主义的文学繁荣论”。他在“论文学运动上自由的要求”一文中，强调资本主义是使近代文学发展和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说：“我们生在这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发展，我们举国上下，正希望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社会形态中，企图甚至用极大的努力，克服一切困难，走上民族解放，民族资本建设的大道”。他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发展”，宣传中国“解放”的道路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因此，他那样热情地歌颂着资本主义，说它是使近代文学繁荣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他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不是十分鲜明的么？

从上面简单的叙述，可以明白許杰这本为蒋介石的“最高国策”服务的所谓“文艺理论”是一本彻头彻尾的反动“著作”，明显地暴露了他的反动政治立场，白纸写着黑字，用斧头也砍不掉的！

三

一九四八年十月，一方面，人民解放军在东北、西北、河南、山东各线获得了重大胜利，解放战争进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淮海战役即将发动；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发出了逮捕爱国学生及其他民主人士的命令，在上海等大城市逮捕、枪杀了大批革命群众，实行了法西斯的恐怖镇压。就在这敌我斗争异常尖锐的时机，许杰发表了一篇“論小资产阶级与文艺”，打出了“小资产阶级文艺”的旗帜。他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几个主要的论点：

（一）他说：“‘五四’运动是一个划时代的转变。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上了政治的舞台，负起了民主革命运动思想文化改造一环的重大任务。这是一个时代感召，中国的市民阶级，主要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已经在这一个运动中抬起头来。在文艺领域当中，他们已经慢慢的从自发的转向了自觉的道路，他们肩起了文艺运动的重任，准备用文艺运动，来报效民族国家，替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出一份力量。”

我們都知道：“五四”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起点，是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日子，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领导的“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诞生的时日。毛主席在一九四〇年所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論”里对这問題說得非常清楚。而许杰却直到一九四八年十月，还要宣傳“五四”是市民阶级，主要的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上了政治的舞台”，“在这一个运动中抬起头来”，“肩起了文艺运动的重任”。这不仅是对“五四”的估价的歪曲，而且是公然对毛主席的主張，中国共产党的看法的对抗。

（二）他说：“在这一长串文艺运动当中，我們可以不客气，毫无諱飾的說一句話：参加这些文艺运动的，大都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他在这里所說的是指“五四”以来一直到抗日戰爭結束之后，全国解放戰爭全面胜利的前夕的文艺运动。我們都知道，在那个时期（一九四八年），不仅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左翼文学已有了二十年的历史，而且在抗战期中，以延安为中心，在广大的敌后根据地里，培养了大批从工农兵大众中来的文艺家，并且改造了不少的知識分子，使他們成为工农兵大众的文艺队伍。而許杰却抹煞了这一切事实的存在，硬把文艺領域說成是小資产階級知識分子的独立王国。这完全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不仅如此，他竟还武断地說：

我們說过，在过去文艺发展的道路上，小資产階級知識分子，几乎是文艺运动的主力軍；今天的情形，也沒有完全的改变。

从这里所透露的，已經不仅仅是把过去的文艺运动当作小資产階級知識分子独占的陣地，而且还排斥工人階級的文艺队伍，不許党的领导力量在文艺工作中插手。

（三）他又說：“小資产階級知識分子，在实际的社会变革的行程中，自然赶不上工农分子的积极，也赶不上工农分子所发生的力量，但在文化运动这一領域当中，很显然的，这是他們的有力的陣地。”

很明显，他是頑强地把文化运动当作小資产階級知識分子独占的陣地，把小資产階級估計为文化运动的主力，而完全否定了工人階級的先鋒队——党对文化运动的领导，更否定了小資产階級文化工作者需要进行彻底的思想改造。可見他

今天完全否定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其根源是很久远的。

(四) 最重要的，是他把“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估計为一个整体，一种中間力量。他說：

等到后来，封建社会慢慢地沒落下去，中国的資本主义社会，虽然没有正确的形成，但这些构成中間阶层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却仍旧負担着文艺創作者的任务；而在同时，他那由階級所决定的階級意識，搖摆于統治者和人民大众中間的心理傾向和創作傾向，还是一直秉承着过去的傳統，傳統下来的。

我們承認：小資產階級在整个社会階級关系中是处在中間地位，他們可能为統治階級服务，也可能为劳动人民服务，但他們决不会成为一种中間力量，更不可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中間阶层。历来，在人民大众对反动統治階級的斗争中，在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中，他們必然会起分化，有的成为革命的战士，有的成为反革命的爪牙，第三条路是不存在的。所以，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决不可能永远“搖摆于統治者和人民大众之間”，事实上，这种所謂“搖摆”也并无什么“过去的傳統”可以“秉承”，更不可能在今后“傳統下来”。他們在每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往往不是成为統治者的奴才，就是成为人民大众的战友，中間路綫是不存在的。而許杰却認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可以永远“搖摆”于革命力量和反动势力之間，走“中間阶层”的一条单独的道路。这种第三条道路的提倡，实际上就是与当时的罗隆基、張君勱等的騙人的“中間路綫”相呼应。魯

迅早在一九三二年就說過：那些要做“第三種人”的人們，“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頭髮，要離開地球一樣”。所以，許杰在一九四九年大軍渡江之後還幻想“和談”，決不是偶然的；而到解放後的第八個年頭，還會成為“章羅聯盟”的反黨陣綫中的一員勇將，成為右派分子施蛰存的保護人，更絕不是偶然“碰上”的！

我們知道許杰的這些歷史，並非從今天開始；但是，我們過去不願談。因為我們認為人是在發展的，從錯誤的道路上走過來的舊知識分子，只要真心願意接受思想改造，就可以走到勞動人民的隊伍里來，甚至也可能成為站穩無產階級立場的文化工作者。然而，許杰從鳴放以來的反動言行，卻給了我們相反的回答！今天，我們指出他的這些歷史，只是為了揭露他的發展規律，他的政治本質，並證明他所說的“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反動思想，完全是欺人之談！直到現在，我們還是希望許杰徹底檢查和交代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動機。

原載“解放日報”一九五七年九月七日

許杰的一條反社会主义道路

羅 霖

許杰自称为“忠厚人”，从表象看来，也很有一些人覺得他是一位“忠厚人”。他在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召开的作家座談会上一再表示自己几年来沒有写多少作品，因此一再的申述：“我每次参加作家协会开会，总感到很惭愧”。确也博得了一些人的同情。而他在发言中述說到他在解放以来所以很少写文章的原故是由于教条主义的批評，使得他“胆子小，怕犯錯誤”，所以不敢写了。

許杰是一位老作家，解放前确是写过不少作品，包括小說和文艺理論批評，單單編印成集的就有那么十来本。可見他在解放以前是很“敢写”的。不說別的，就是他在上饒的短短一两年中就写出过一部十六、七万字的論文集，足見在当年是很敢写的了。解放以后他的“不敢写”，据他自己說是对政策掌握不住，所以胆小不敢写；反过來說，他在解放前之所以敢写是因为他很掌握了当时的“最高国策”的了。

許杰在一本文艺評論集叫做：“文艺、批評与人生”的自序中曾講到人和文学的关系，他主張：“不是用看人的眼光看文章，用看文章的眼光看人。”他在解放后很少为文，因此要“用看文章的眼光看人”，就来看看他解放以前的文章吧，或者可

以使我们了解一些这位“忠厚人”的本相。好他在自序中也說得很清楚：“我的态度、我的主張，自己却未敢加以否定。我觉得，文学与人生是統一的，而且是合一的。”并認為是“不能輕易改变的”。他还認為把文章印成集子正是为了“討得別人的了解”。

那末，我們就从这本书里来了解一下“忠厚人”的“态度和主張”吧。

許杰当年大声疾呼：文艺要为蒋介石

王朝的“最高国策”服务

报載座談会上有人揭发許杰当年曾在上饒集中营中对“政治犯”做过报告，他的报告和他的文章都是在宣揚当时的“最高国策”是不成問題的了。他的这本“文艺、批評与人生”，是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出版的，由上饒战地图書出版社印行。其中包括大部分文艺評論，都是在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年写的。当时的上饒是国民党第三战区顧祝同反共的大本营，在那里屠杀和禁閉过无数新四軍的战士、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特别是到了抗战末期，反动統治干了些什麼，我想不必多述，人們是很清楚的。

而許杰当年是“东南文坛”上的一員主將，从他的許多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在指导着“东南文艺运动”，并且有政策、有口号也有一套办法。

他在“論文艺批評的建設性与积极性”一文中提出了“文艺运动的最高准則，是和現阶段的最高国策相互一致的”。蒋介石王朝的“最高国策”是什么，历史已經給它做了結論，即使